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成果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南亚与当代国际问题研究创新基地成果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成果 (skq201213)  
《南亚研究译丛》系列成果

#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 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

[巴基斯坦]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 著  
曾祥裕 赵超兰 孟雪 译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后苏联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冲突

塔利班的到来

后“9·11”时代的阿富汗

外部大国的利益与关切

宗教性武装活动和极端主义对巴基斯坦的挑战

巴基斯坦：思想危机与治理无力的一个实例

Conflict, Extremism and Resistance to Modernity

时事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成果  
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南亚与当代国际问题研究创新基地成果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成果 (skq201213)  
《南亚研究译丛》系列成果

#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 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

[巴基斯坦]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 著  
曾祥裕 赵超兰 孟雪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 /  
(巴基) 汗 (Khan, R. M.) 著；曾祥裕，赵超兰，孟雪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7-80232-689-7

I . ①阿… II . ①汗… ②曾… ③赵… ④孟…  
III. ①阿富汗问题—研究 IV. ①D81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4439 号  
图字：01 - 2014 - 6923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 行 热 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 者 服 务 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 子 邮 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23.25 字数：381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译序 >>> \_ 1

中译版前言 >>> \_ 5

原书前言 >>> \_ 8

引言 >>> \_ 9

## 第一部分 阿富汗局势：冲突持续不休

第一章 后苏联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冲突（1989—1995年） >>> \_ 23

第二章 塔利班的到来（1995—2001年） >>> \_ 62

第三章 后“9·11”时代的阿富汗 >>> \_ 102

第四章 外部大国的利益与关切 >>> \_ 163

## 第二部分 巴基斯坦的情况及极端主义的挑战

第五章 宗教性武装活动和极端主义对巴基斯坦的挑战 >>> \_ 205

第六章 巴基斯坦：思想危机与治理无力的一个实例 >>> \_ 252

## 第三部分 观察与选择

第七章 结论 >>> \_ 313

参考文献 >>> \_ 358

译后记一 >>> \_ 362

译后记二 >>> \_ 364

# 译序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一书系巴基斯坦前外交秘书（2002—2005年任驻华大使）里亚兹·穆罕默德·汗先生的专著，2011年由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作者将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对世界大势和地区局势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融为一炉，锻造了这部内容充实、视角独特、夹叙夹议、严肃探讨与个人色彩兼具的独特作品。

本书由曾祥裕、赵超兰、孟雪三人合译。受赵超兰、孟雪两位同学委托，曾祥裕代表译者撰写译序。译者开宗明义地说明译稿所遵循的若干原则，以方便读者阅读。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巴基斯坦活动的阿富汗抗苏各派，本书使用的称呼是 Tanzeemat（直译为党派，音译“坦齐马特”）一词，中国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习惯于将其统称为“七党联盟”，故译文径译为“七党联盟”。

本书对人名的使用方式较为复杂：有时使用完整的姓名，有时使用不完整的姓名，有时仅称姓，有时仅称名，有时加上习惯性尊称，而众多的尊称（如 Mullah, Maulana, Maulvi, Allama, Sahib, Haj, Pir 等）往往又可用作正式人名。译文对人名做了统一处理：有传统译名者遵照传统译名；凡姓名连用者遵照原文；仅称呼姓氏者亦遵照原文；仅称呼名者，在确定其身份的前提下，一律补充为全名或改以姓氏称呼；可能的尊称，除 Mullah 译为毛拉并冠于人名之前外，其他一般按读音译出并以间隔号与姓名其他部分相连。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未必最合乎情理，却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混乱。另外，本书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级别的官员及一般读者较为熟悉的当代人物，一般不注明英文原文；其余人物，首次出现之时均注明原文，以便查核。本书大量使用各种源于乌尔都语、普什图语、阿拉伯

语的词汇，作者的拼写颇有异于通行拼写者，译文均以作者拼写为准，望读者谅解。

本书涉及众多的伊斯兰历史文化宗教词汇，译文一般采用音译并在其首次出现时注明原文；必要时在首次出现处附加译注，涉及宗教问题的注文主要出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1988年第1版）。对读者可能不甚熟悉的组织机构或较生僻的地名，译文也在首次出现之处注明原文，方便核对。本书注释均以阿拉伯数字每页单独编号：无特别说明者为作者原注；以“译注”字样起始者为译者，独立译注单独编号，附于作者原注末尾者不单独编号。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资料出处，译文注释部分只翻译了所引报纸的名称，并在其首次出现之处保留原文供查考；对引用的其他文献（如著作或期刊）则按原貌保留其作者、名称、出版信息等内容，仅当文献信息同时用于行文之时才翻译相关内容。中译本保留了附录的参考文献清单，以便读者参考或延伸阅读。

本书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作者里亚兹·穆罕默德·汗先生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惠允我们翻译出版该书中译版。作者和出版社及其代理机构对译者的翻译请求迅速给予积极反馈，令我们深受鼓舞。由于手续繁杂，翻译工作迟至2012年12月才正式启动，但这一延误却也不无益处：作者在2013年4月出版的乌尔都语最新版中根据局势的最新发展对本书做了若干修订；征得作者同意，译者将更新内容约9000字一并译出，略做说明之后附于所在各章末尾，以飨读者。此外，我还要再次向里亚兹·穆罕默德·汗先生表示感谢。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作者的另一专著《解开阿富汗之结》提供了大量信息，颇有启发思路之处。由此说来，我的第一本专著和第一本译著都直接受惠于里亚兹·穆罕默德·汗先生，也是一段学术奇缘。

其次要感谢我工作学习的四川大学及其南亚研究所。我在2012年初以“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发展趋势、对华影响与对策”为题成功申报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本书的版权费用、样书采购费用及出版补贴等均得到项目经费支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始终予以大力支持，还将本书收入“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代表性成果《南亚研究译丛》，令我们深受鼓舞。南亚所诸位师长对译者的工作学习长期给予各种形式的鼓励、关心与帮助，李涛教授、张力教

授、尹锡南副教授等专家对本书翻译出版提出了极为中肯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再次要感谢原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ISSI）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SSII）所长的法扎尔·拉赫曼（Fazl Rahman）先生为译者居间联络里亚兹·穆罕默德·汗先生。我于2011年3—6月受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项目资助，在巴基斯坦国立现代语言大学进修4个月，期间承蒙拉赫曼先生及其助手阿里·阿巴斯（Ali Abbas）先生多方关照，精心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与文化活动，令我在短暂的4个月中收获颇丰。此次又承拉赫曼先生热心提供了宝贵意见，并为本书翻译牵线搭桥，感激之情实无以言表。

最重要的是，我还要诚挚感谢两位合译者，即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2011级硕士研究生赵超兰、孟雪两位同学。本书篇幅巨大，若非多人合力，恐需很长时间才能与中国读者见面。赵超兰、孟雪两位同学中英文语言功底扎实，对安全问题兴趣浓厚且均有自己的见解，学习处事认真严谨。故此，我邀请两位同学加入了本书翻译团队，同时也将此视为课堂之余的教学探索。赵超兰同学主动承担了三章内容的翻译工作，勇气实堪嘉许，原因不仅在于其翻译量很大，更在于第五章和第六章集中探讨极端主义的源流，涉及大量宗教、文化、政治乃至历史术语，其中很多甚至根本就不是英语词汇，故实为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孟雪同学承担的内容涉及“9·11”以来的阿富汗局势变迁和周边国家的利益关联，内容繁杂，头绪众多，同样非常富有挑战性。此外，正式落实翻译分工之时已接近寒假，临近春节。上述因素都令人颇为不安。正是因为一度存在种种担心，当我拿到初译稿的时候，确实感到相当欣慰，因为译稿质量已超出了预想。这一良好基础也令本书后续的校对与统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遗憾的是，为了保持全书语言风格一致，统稿之时对两位同学的文字进行了一定技术处理，大大削弱了其个人特色，是为憾事。赵超兰和孟雪两位同学作为本书译者，表现出了良好的文字功底、语言能力、专业素养以及高度的责任心。作为合作伙伴，我愿对她们的出色工作表示诚挚感谢。两位同学首次承担大规模学术翻译的重任就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并不轻松（实际上，应该说是相当繁重）的工作，相信她们将来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其他工作，都会一如既往地取得同样甚至更加出色的成绩。对此，我深信不疑。另外，这一较为成功的经验也鼓舞了我今后继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尝试类

似地合作翻译教研实验。遗憾的是，本书翻译的相关设想还有若干方面并未实现，两位同学的劳动尚未得到更充分的体现，是为另一憾事。

古人说，择业不可不慎焉，原因或许在于，职业足以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取向产生直接乃至决定性的影响。虽然时光总在流淌向前，但自2003年在四川大学攻读研究生以来的10多年间，我却从未有过青春流逝之感。或许这就是选择留在校园的原因，因为这里总是与青春朝气相伴：时光照样会流逝，容颜逐渐会老去，但心情却可永不衰颓，永远都能与一群青年相处，在那段最美好的时光。与所付出的相比，收获的其实反倒要多得多……本书翻译期间，我的同门师妹张春燕从北京外国语大学顺利毕业并回到四川大学工作，本书的翻译深深地受惠于她和另一同门师妹朱宇凡及老友唐勇的鼓励和支持。对于他们，感谢之辞已属客套，所以请容我仅送上深深的祝福。

中译本保留了原书原貌，仅略去原书索引和两幅地图。本书翻译分工为：赵超兰负责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孟雪负责第三章和第四章；曾祥裕承担其余内容，即中译版前言、原书前言、第一章、第七章（结论）以及2013年版新增内容。全书由曾祥裕统稿校对，并增加了译注。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及内容系作者的个人学术观点，为了提供原书的准确内容供广大读者参考，译文对原书内容（包括某些不甚妥当的提法如所谓1857—1859年的“印度大叛乱”）未予更动。本书具体信息是否完全准确，观点是否完全可取，某些提法是否应予接受，敬请读者自行判断。

本书知识面广，翻译困难。译者虽竭尽全力，仍恐力有未逮，或有错漏不妥之处，敬祈读者惠予指正，并将意见发送至zengxiangyu80@gmail.com，三名译者不胜感谢之至。

是为译序。

曾祥裕

2014年8月27日

于成都四川大学

# 中译版前言

很高兴我的专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中译版现已面世。翻译本书是个耐心细致的工作，需投入大量精力。为此，我要感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曾祥裕博士提议翻译此书，还要感谢川大南亚所的赵超兰和孟雪两位同学与曾祥裕博士共同完成了这一工作。

本书于2011年出版，内容截止于2010年。这个中译本进行了一定更新，涵盖了到2013年初为止的新情况。无论如何，阿富汗和本地区现在的局势同2010年实在别无二致，仍然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的状态。2014年会迈过一个门槛：阿富汗将于2014年如期举行总统选举。根据阿富汗现行宪法，卡尔扎伊总统将不再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目前其继任人选的问题仍然看不清楚。美国在阿境内遗留驻军的前景同样不能确定，这一前景将取决于阿富汗政府是否会签署赋予2014年之后的驻阿美军司法豁免权的协议。美国未能从伊拉克的马利基政府处拿到类似的协议，故而不得不从伊拉克完全撤军。卡尔扎伊政府支持这一协议最主要乃至唯一的理由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美国驻军来应对以巴基斯坦为活动基地的武装分子。这种情况表明，一般阿富汗人并不支持这一预期中的协议，卡尔扎伊也希望避免承担签署这一条约的责任，不希望令美军持续驻扎成为他本人的遗产。这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卡尔扎伊对巴基斯坦那种“忽冷忽热”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赞成这种安排的势力则认为，为了维系新组建的阿富汗国民军不至于解体，阻止塔利班卷土重来，避免另一场大规模内战，美国保留驻军实属必要。谈论这种极端情形凸显了阿富汗局势不稳的困境，而消除这种局势原本正是美国的军事干预行动和整个波恩进程所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和解进程的命运。美国最终决定在卡塔尔同塔利班

方面接触，希望能启动卡尔扎伊与塔利班之间的对话，但这一进程甚至在双方正式会晤之前就因程序上的纠纷而陷于停滞。这也揭示出与相互角逐的阿富汗各方打交道的困难程度。塔利班的观念对妥协的容忍空间微乎其微，不过他们在地方上还是愿意作出一些调整的。阿富汗局势的最大希望在于塔利班的动机逐渐削弱，以及普什图人在喀布尔的政府与安全架构方面的参与度逐步加大这两个方面。

巴基斯坦公开宣布乐于助和解进程一臂之力。喀布尔和华盛顿均抱有期待，希望巴方可对塔利班施加影响，促使其实质性参与和解进程。然而经验表明，巴方对塔利班的影响力是颇为成疑的，巴方也说不上是否掌握着解决阿富汗冲突的钥匙。然而，阿富汗冲突确实与同样艰难的巴基斯坦局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原因在于巴境内存在若干塔利班领导人和庞大的阿富汗难民群体，还在于他们与正在毗邻阿富汗的部落地区挑战巴基斯坦政府法令权威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存在联系，同时也是因为宗教极端主义正在巴境内扩散、大众对发生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美军无人机袭击事件的情绪越来越激愤、那种巴基斯坦被拖入了一场美国的战争的观点已广为传播等等。尽管存在这些复杂难题，阿富汗的稳定仍最为符合巴方利益；反过来说，巴基斯坦政府逮捕极端分子和反叛势力并清除其危害的能力也有助于平息阿富汗冲突。卡尔扎伊总统极为贴切地将巴阿两国的关系描述为“连体双胞胎”。实际上，以上所描绘的正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对“连体双胞胎”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美国正在逐步撤军，地区国家此时不应利用阿富汗国内那些对冲突推波助澜的长期分歧，这将对改善局势有所助益。和解行动就其本质而言必须是由阿富汗人自己推动的阿富汗进程，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在内的外部势力可在确有需要之处发挥支持性作用。对阿富汗逐步实现稳定来说，外界在经济振兴与重建领域的帮助很有必要，甚至可谓至关重要。自波恩进程启动以来，国际经济援助就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那些相对平静的地区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与所投入的资源相比，取得的成效仍颇为令人失望，原因在于腐败盛行，在众多的付款机构之间缺乏规划且协调不力等。归根结底，巴阿两国的经济进步与经济发展将决定能否成功令阿富汗稳定，能否帮助巴基斯坦克服极端主义及其所催生的暴力活动之害。此时，身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在本地区乃至全球均有利益分布的中国，无疑可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

中国已对开发阿富汗南部的艾娜克铜矿并建设连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以便将其作为出海口）的铁路表达了兴趣。瓜达尔港是中国应巴方要求而开发的，现由中国公司管理。巴基斯坦政府有计划借助铁路和公路将这一港口与中国新疆联系起来。这一港口还可成为中亚商路最近的出海口。长远来说，借助于稳定的局势和经济发展这对相互巩固的力量，本地区可成为大中亚地区生气勃勃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在这一大中亚地区无疑具有重要而持久的利益。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

2013年8月

# 原书前言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在 2009 年末之前已完成，其大部分论述和分析的依据都是此前的各种事件及经历。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我又根据 2010 年的有关情况做了必要更新。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North – West Frontier Province, NWFP）在 2010 年 4 月更名为开伯尔—普什图省（Khyber Pakhtunkhwa, KPK），本书仍沿用旧称。

感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 2009 年 1 月至 8 月接纳我为“巴基斯坦研究学者”（Pakistan Scholar），本书受惠于这一项目。深深感谢巴基斯坦各位企业家赞助了该中心的“巴基斯坦研究学者”项目，感谢我的朋友伊什拉特·哈桑博士（Dr. Ishrat Hussain）在 2008 年末联系我，询问我对这一位置是否感兴趣。感谢该中心亚洲项目各位成员，你们令我此行舒适而难忘。特别要感谢亚洲项目主任罗伯特·哈特威（Rober Hathaway），在我编定本书第一稿的时候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建议。感谢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出版社主任乔·布莱利（Joe Brinley）和该社总编辑（managing editor）雅米尔·卡恩（Yamile Kahn）在出版事宜上的大力帮助。布兰顿·莱普斯利（Brandon Lapsley）和丹尼尔·格林伯格（Daniel Greenberg）协助我从事研究，对此亦深表感谢。最要感谢的是玛格丽·博彻尔·汤普生（Margery Boichel Thompson），她细心而出色的编辑工作令本书的文字水平和整体效果增色不少。十分感谢众多的朋友和同事与我慷慨分享其经历与观点，其中有些已在本书正文和脚注中提及。

里亚兹·穆罕默德·汗

2010 年 12 月

# 引言

本研究始于苏联 1989 年 2 月从阿富汗撤军后该国局势的发展，包括肆虐阿富汗的国内冲突及外部大国的利益与关切。冲突首先涉及各圣战者团体，然后是塔利班，最后是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干涉。

第二部分关注极端主义和宗教武装活动在巴基斯坦和本地区的兴起、这一现象的前身及其与阿富汗圣战<sup>①</sup>的关联。本书考察了过去 30 年来的各种事件和诸多变化，揭示出萦绕于对巴基斯坦社会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的那些全国性讨论与认识之上的困惑情绪。巴基斯坦只有妥善应对这些挑战才能实现生存、发展与进步。更根本的是，一场思想危机已阻碍了巴基斯坦向现代性迈进。

本研究并未建立在严格而详尽的探讨之上，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本书不能自称为学术著作。其实，阿富汗相关主题的材料如此之多，令我惊骇不已。我只能承认，很难既不展开过多，又能对事态发展揭示些新鲜内容。因此，本研究对诸多事件做了粗线条处理，并力图将个人经历、各种视角与评价整合到对涉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诸多事件与发展动向的大叙事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并确保编年记载的确切性，我采用了各种已刊文献，对此我充分承认。不过，对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之中很多事件的描述都是基于我在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外交部担任各种

---

<sup>①</sup> 译注：本书使用的“圣战”（Jihad）一语为伊斯兰教的特有概念，其本意是同与伊斯兰教相背离的倾向做斗争，主要是指精神上的虔诚与纯洁，实践中严守伊斯兰教规等。尽管圣战也包括为捍卫甚至扩张伊斯兰教进行军事斗争，但这并非其主要内容。在阿富汗战争中，反抗苏联及阿富汗当局的武装人员自称“圣战者”（Mujahedeen），并将其武装斗争称为圣战，西方也如此使用这一对词汇。这是出于特定目的而对“圣战”与“圣战者”作出的狭义解释。

职务期间，处理阿富汗事务所获得的个人印象。<sup>①</sup>

本研究探讨了后苏联时代阿富汗冲突动态变化的众多相关问题、阿富汗的军阀割据、民族分野的尖锐化以及塔利班在阿富汗受到国际社会冷淡和孤立的情况下兴起的情况。在第二章，我详述了塔利班作战活动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的若干细节，资料来源主要是各种公开出版的文献和我各位同事的回忆。提到这些多已为人所知的细节，理由有二：首先，它们提供了一个背景，有助于理解那些加剧了塔利班的孤立处境，并推动巴基斯坦的政策滑向我所要讨论分析的沿民族分野划限的重要因素。其次，也许更有趣的是，这些作战活动（及其机动性、灵活性、不断变换的联盟关系、退却与成功等）不过是重演了各种权力角逐者或觊觎者的老戏，也就是他们早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受不断推进的欧洲帝国挤压之前的若干世纪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因阿富汗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时空倒错般地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这种局面难以在未来重现）而成为可能。

20 世纪 80 年代在阿富汗发生的那一幕成为 20 世纪最后 10 年两个迥然不同的指标性变化的催化剂。其一是，随着苏联解体，自由在东欧兴起；其二是，以“基地”组织的圣战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激进伊斯兰武装势力得以成形。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事件、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干预行动以及随后的美国入侵伊拉克行动，均属 21 世纪初的决定性事件之列，对地区和全球均势均有深远影响。

美国的干预行动导致了塔利班统治崩溃，促成了成功的波恩进程，后者塑造了卡尔扎伊任总统的喀布尔全新权力分配格局。然而，经过 9 年之后，美国仍留在阿富汗，陷于其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之中。美国的关注焦点转到了伊拉克，未能恢复阿富汗经济，没有在阿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由此导致阿富汗冲突延续不休，为塔利班在普什图人为主的阿富汗南部与东部地区重组并站稳脚跟提供了机会。美国仍在摸索促进阿富汗未来稳定的各种方案。本研究将从巴基斯坦的视角分析这些发展并

---

<sup>①</sup> 我在本研究涵盖时段担任的三个职务分别是：1986—1992 年任负责阿富汗事务与苏联事务的局长；1998—2002 年任负责国际组织、裁军与军控事务的辅秘（additional secretary）；2005—2008 年任外交秘书（foreign secretary）。译注：巴基斯坦文官系统之中的辅秘一般相当于部长助理，秘书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讨论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行为体的作用。

本研究的起点是苏联 1989 年从阿富汗撤军，在此简要回顾一下那一事件之前的若干重大事件将有所助益。

自吉尔扎伊 (Ghilzai) 和阿布达利 (Abdali) 部落 1747 年在坎大哈附近举行会议并奉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 (Ahmad Shah Durrani) 为国王起，阿富汗王国就一直是由阿富汗各部落组成的松散邦联式独立国家，内为争斗所苦，外有大国压力。旁遮普的锡克教统治者兰吉特·辛格 (Ranjit Singh) 大君在 1823 年归并印度河以西的白沙瓦及邻近地区，这是第一个外部压力。很快，一个厉害得多的对手（即英印帝国）取代了锡克教王国。英国对沙俄在中亚的扩张感到关切，并为此采取了前进政策。英军在 1838—1842 年间侵入阿富汗，其结果是灾难性的。1878 年，英军再度来犯并短暂占领了坎大哈和喀布尔。第二次英阿战争导致了 1879 年的《甘马克条约》(Treaty of Gandomak)，这一条约将开伯尔山口和库拉姆 (Kurram)、毗辛 (Pishin) 和锡比 (Sibi) 等地割让给英方。

此前的 1873 年，英国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即克拉伦登—戈尔恰科夫协议），俄国同意将阿富汗划到其势力范围之外，同意以阿姆河为其未来的中亚扩张的边界。阿富汗逐渐成为互相怀疑并逐步推进的两个欧洲帝国之间的缓冲国。在这场“大博弈”中，英国需要确立阿富汗的南部边界。英国施加了压力，并向阿方保证支持其抵御俄国可能跨越阿姆河实施的跨界行动。阿富汗埃米尔（国王）阿卜杜勒·拉赫曼·汗 (Abdul Rahman Khan) 签署了《杜兰协定》(Durand Agreement)，划定了其南部边界。作为继承国的巴基斯坦在 1947 年继承了这一边界。阿富汗人念念不忘 19 世纪受到的损失，但这不过是很多国家都要在其记忆中承载的历史负担。

下一个致命事件是 1979 年 12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并从此将阿抛入动荡之中。按苏联的设想，这一干涉行动本应是场短期行动，目的是挽救奉行马克思主义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DPA) 所发动的诞生仅 20 个月就摇摇欲坠的四月革命 (Saur Revolution)。苏联在 1979 年不断推进，美国则从印度支那、伊朗、非洲之角、安哥拉甚至尼加拉瓜这一美国后院节节后退。当时看来，苏联在

1979 年入侵阿富汗似乎也是这些连续事态的一环。随后的 10 年，苏联一直陷在阿富汗，这也成为冷战的最后一条前线。

巴基斯坦卷入了冲突，首先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因为这一入侵行动给了齐亚·哈克总统一个机会，以此来打破巴基斯坦在其发动军事政变并处死其前任（即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之后所遭受的国际孤立。同时也有这样一种战略考虑，认为即便苏联现在并未力图抵达印度洋暖水区域，<sup>①</sup> 但若是其在阿富汗巩固了地位，巴基斯坦就会成为其下一个目标，至少理论上是如此。自 1978 年以来，阿富汗国内已初步形成了反喀布尔马克思主义政权的部落抵抗势力和伊斯兰抵抗势力，苏联的入侵行动令这些势力取得了正当性。巴基斯坦、美国、其他国际援助力量、阿富汗境内的作战人员、在巴基斯坦避难的数百万难民等因素汇合起来，将抵抗运动转变为备受瞩目的阿富汗圣战。

10 年之后的 1989 年 2 月，当最后一名苏军士兵按联合国在日内瓦促成的安排而渡过阿姆河并返回家园的时候，他所步入的是一个已发生巨变的世界：冷战即将拉上帷幕，而他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历史巨变的关口。1979 年苏联决定入侵阿富汗，这对阿富汗产生了最为悲剧性的影响。极端主义和宗教武装活动的兴起、“基地”组织的成形，都与苏联的军事干预及其出乎意料的各种后果密切相关。苏联撤军后，国际上对阿富汗与地区局势无动于衷，令问题进一步加剧。第一章和第二章讨论了这些事态发展，以及那些继续肆虐阿富汗并令巴基斯坦和整个地区极为痛苦的各种势力。

联合国主持了推动苏联撤军的漫长磋商，另外还有各种类似的磋商。它们曾初步探讨了建立民族和解政府以促成撤军的问题。尽管如此，在早期，唯一可行的要求只能是制订撤军时间表。苏联一开始坚持认为，即便苏联要撤军，那也不应由联合国加以干预，而是只能在外部（即巴基斯坦的）干涉停止且确有必要的情况下，由苏联和阿富汗进行双边讨论来决定。在巴基斯坦，早期的争论同样集中于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概貌，特别是流亡政府的问题。君主派颇有影响，他们主要以欧洲和巴基斯坦

<sup>①</sup> 一般认为俄罗斯向暖水区域推进的政策出自真实性未经验证的“彼得大帝遗嘱”。更多细节可参考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2), 第 20 页。

的奎达为活动基地。这些地方有一批与坎大哈有联系的家族，主张建立由查希尔国王的支持者组成的流亡政府。<sup>①</sup> 巴基斯坦政府最终决定，选择以白沙瓦为基地的阿富汗领导人领导的七个圣战者党派（Tanzeemat）。

这一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而然的，但人们还是怀有戒心，认为在无法预测苏联撤军前景的情况下，在巴基斯坦领土之上建立的流亡政府很容易成为长期化的麻烦问题。而且，那些在达乌德总统发起镇压活动之后的 1973 年逃离阿富汗，并以白沙瓦为基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强硬派领导人，也不同意让查希尔国王发挥作用的任何安排。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nter – 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这一负责联络阿富汗抵抗运动各派的主要渠道更愿意与 7 个分立的派别交往，不希望与某个可能有一定国际声望的统一实体打交道。

巴基斯坦已同意在联合国主导的磋商中放弃建立民族和解政府的想法，因为在联合国占据阿富汗席位的人民民主党政权不能接受将这一条款纳入议程。然而，巴基斯坦的谈判代表和齐亚·哈克总统仍然相信，苏联一旦同意撤军，它就会希望在喀布尔留下一个稳定的、基础广泛的政治安排。几年过去了，这一企盼逐渐退居幕后，谈判更明确地专注于撤军时间表的问题。但上述企盼其实是可行的。在于日内瓦抛出撤军时间表之前，苏联在 1986 年 12 月暗示要寻求巴基斯坦的合作，促成喀布尔政府与圣战者七党联盟对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基斯坦对此并无准备。在政治上，齐亚·哈克总统和居内久总理关系紧张。阿富汗圣战者强硬派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巩固，他们对任何外交行动都疑虑重重。三军情报局也有类似疑虑。1986 年中期引进的毒刺导弹帮助阿富汗圣战在近期取得了多次成功，促使苏联发出了某些信号。但三军情报局对苏联的信号并不信任。齐亚·哈克直到 1987 年才看到时机，开始呼吁在喀布尔建立和解政府；戈尔巴乔夫此时已宣布了其在 1 年内撤军的建议，并呼吁签署几近就绪的《日内瓦协定》。然而良机已经错过。圣战者强硬派领导人拒绝了齐亚·哈克的和解倡议，拒不考虑对话。戈尔巴乔夫颇为急迫，对建立民族和解政府那漫无限期的

<sup>①</sup> 巴基斯坦一开始对查希尔国王访问奎达持开放态度，但查希尔国王希望巴基斯坦在接待其来访之前先要创造条件，确保支持其可以发挥必要作用。一般认为查希尔以前的性格并不是那么积极主动。